

沈从文 40 年代创作的生命色彩

内容摘要：沈从文 40 年代的创作转入理性的思辨，在面对非理性的战争带来的对生命的残害、政治对人生命的压迫，现代文明对传统生命的侵蚀的种种后，从而开始对生命进行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通过对这个时期他的小说、散文、文论及一些信件、报刊中的剖析，解读出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借以生命的理性来改变战争的非理性，以文学的重建来摆脱政治的束缚，期盼作家能以文学来重振民族的自尊心，最终以不停的追求“爱与美”达到对生命思考的深化。

关键词：40 年代 创作 生命

Shen Congwen 40's Creation of the Colors of Life

Abstract: Shencongwen rational speculative transferred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1940s, in the face of mutilation of irrational war to life, Political oppression of human life and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n the erosion of traditional life and on, which began on life thinking,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this period of his novels, essays, Wen discussed a number of letters,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in the newspapers, interpretation of life thinking. In order to life reason to change the non-rational,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look forward to a writer of literature to revive the nation's self-esteem, and ultimately to stop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beauty to think of life deepen.

Keywords: 40years; creation; life

目 录

一、引言	1
二、40年代创作的大背景	1
(一) 被战争残害的生命	1
(二) 被政治压迫的生命	2
(三) 被现代文明侵蚀的传统生命	3
三、生命的理性色彩	4
(一) 解读生命意识	4
(二) 批判战争的非理性	5
四、生命的功利性色彩	6
(一) 与政治远离的生命	6
(二) 被文学重建的生命	7
五、生命的非功利性色彩	8
(一) 追求美	8
(二) 追求爱	10
六、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沈从文 40 年代创作的生命色彩

一、引言

沈从文作为上个世纪的文学大家，留给后世很多值得回味的作品。而纵观那些研究型文章，可以不难看出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沈从文 30 年代的文章中。从 30 年代的顶峰期开始，他成了蜚声中外的作家。1937 年 7 月 7 日开始，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沈从文先生与朱光潜、杨政声等人经过武汉辗转来到云南避难。西南联大的创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沈从文的一个转折点。一群文人志士聚在一起，为文学谋求出路，也为国家群策群力。他一边延续着他原来的创作，一面又尝试着新的创作。“我好象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¹他此时沉浸于对于生命深度的思考中，他想借以生命的理性来改变战争的非理性，以文学的重建来重振民族的自尊心，最终以“爱与美”为信仰净化生命。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些小说、散文、文论以及一些信件、杂文中都有他对着生命的解读，清晰的看到他对于生命的探索。

二、40 年代创作的大背景

（一）被战争残害的生命

40 年代开始，战争已打了三年，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政府虽然还是国民政府，但却早就腐朽不堪，而红军的势力正在逐步扩大、增强。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也从这时蒙上了浓重的战争灰色调。虽然我们不能把人物的悲剧完全归结为战争，但是却也是因为战争这个人物才更从生命的深处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对于战争我想大多数文人没有他那么感受颇深。沈从文先生因为曾经当过几年兵，所以他说他“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²因而，对于战争，他必有不同于旁人的深刻看法，他在军队中看到了许多的腐朽，所以他离开了军队而随着五四的浪潮来到了北平。战争后逃到云南的日子也不轻松，每天都是头顶上有轰炸机，人民活的人心惶惶的，却也不得不继续生活着有袭击就躲避，没袭击，一切照旧。从小时血淋淋的杀戮到现在每天打不完战争，这些留在他的心中，他开始厌恶这些。《王嫂》被认为是他 40 年代表现战争较出彩的一部小说作品。这部作品涉及了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性，

¹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 11 卷·文论），花城出版社，1983 年，第 294 页。

²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9 页。

却流露出人物摆脱不了命定的悲剧的宿命论。在生命遭受摧残后，女儿死了，一开始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痛心疾首，儿子最后也去投了军。王嫂对于当兵的态度，这个“乡下人”对于战争带来的一切始终是忍受，不抗争。我们却发现作者在结尾处笔锋一转，让王嫂去偷偷的烧纸钱，默默流泪，顿时满篇被压抑住的悲剧感迎面而来。我们从人物的内心看到了她充斥着只能对命运认同的感知，却也无能为力。作者对其的同情不言而喻，对于战争带来的人性的毁灭，道德的堕落，从笔锋晕荡开来。

而他对于国共内战是极力不满的，在经历过辛苦的八年对外战争后，国民还没好好地休整，国内双方却又起了争端。针对这种他认为的“集团屠杀方式”，他言辞激烈地谴责这种情况，认为“这个国家的破产的光景已经差不多了”¹。双方的这种行为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遍地都是流血，自相残杀的场景如此触目惊心。他希望借助五四的精神来涤清一下人的思想，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在《记蔡威廉女士》中他说到“中国各地方正有百万人在为国家打仗，我家乡朋友亲戚，已死丧了上千人，不少下级军官，伤痕未愈，就即刻用荣誉师名分接了四营新兵，又出发向前打仗去了。”²战争夺取了许多人的性命，他的亲人朋友在战争中离他而去，军官伤痕未愈就被调入战场，种种这些都是对战争残害生命的控诉。民族的伤痕也没有痊愈，即又被战争弄得伤痕累累。民族振兴就这么被抛掷在了身后，所以他把战争否定了。

（二）被政治压迫的生命

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此时的国民政治已经腐朽不堪。在文坛上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势力的阵营水火不容。可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他在40年代与一起来到西南联大的杨振声等人被称为“战国策”派，并且主张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融合为一”和“政治融合为一”。他怀着真挚的热诚一门心思地钻研在文学中，作着不断地尝试，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混乱中，坚决地守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想以自己的努力坚持着文学这份纯净之地，却不想来自政治的压力迫使他必须站队，要么作为人民服务的作家，要么就是反动作家。可是他却不愿让文学政治化，文学可以自己独立的存在，不与政治沾边，只讲求一种纯粹。因此他遭到了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压力，特别是左翼作家的激烈批评。一篇题为《1948年小说鸟瞰》中指责了“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幻美倾向”。在这些批评中对他批评最猛烈的是郭沫若。在1948年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郭即把一些作家集中起来批评，把沈从文看作了是桃红色的作家，斥责他是反动的作家，并鼓吹人民的势力“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在当时的激进文人看

¹沈从文：《五四》，《沈从文全集》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²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来，郭的这番说辞必定是光明的旗帜，所以才在 1949 开始掀起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浪潮，他甚至自杀未遂。我们发现在经过这次波折之后，他鲜少出现文学作品，最多的就是重编的作品集。可见来自于政治的迫害对他有很深的影响。

政治的迫害不仅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好友丁玲与胡也频在 30 年代也曾遭到国民政府的拘禁，甚至胡也频丢失了性命。政治对于生命的压迫在这个时期只是变得更加严峻。不仅有来自国民政府的还有来自革命政府的。从 30 年代的身边人的迫害到 40 年代自身受到的压迫，都让他感到深深地悲痛与怅然。并且国家的掌权者手握着政治作为自己的武器，开启了战争，从此走上了双方互相械斗之路。

沈从文这个时期不仅明白地用文字批评了这种现象，也用了隐藏的手法批评了政治压迫和愚昧，特别是那些涉及国民党极右派的新生活运动的事。诸如在《乡城》中下乡宣传的事，来的要员每次都是走过场，带走一些乡村土特产即是宣传，以及《长河》中不停地出现的“新生活要来了”的消息所带来的恐慌，这些事件都很能流露出他深深地谴责。什么是“新生活”，还不是老旧的格式，换汤不换药的腐朽的官僚主义。正如他在《乡城》最后所提出的，能不能真正了解“乡下人”要的是什么，真正为“乡下人”做点事。这种对于政治无声地控诉，必是他在体味了过多“乡下人”对于新鲜政治带来的退后作用后的一点点进步的建议。

（三）被现代文明侵蚀的传统生命

战争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动荡，不仅经济、政治方面饱受影响，连文化也备受摧残，乡下文明与城市文明不断碰撞，现代文明入侵传统文明。以他的小说《张大相》中的张大相为典型，他是一种现代文明侵入传统文明时的代表的例子，他得到一个大电筒就显摆了很久，甚至于集体都陷入了一种盲目崇拜的境界。文章中的大电筒就是物质文明的象征，张大相是传统的典型代表，当他与物质文明接触后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新奇感。其他见到电筒的人也都情态各异，老妈子，姨娘，丫头，老太太的反应给我们一种乡下人看西洋镜的感觉。最终的一句让我们体味到了一种变质的文明“大相家中人等候着他回家吃晚饭，全知道大相今天迟迟回家的原因。大相高兴了，家中人无不极其高兴。”乡下人的纯朴已被现代二字渐渐抹去，也正是这点反衬出乡下人单纯的性情。他对于“下乡宣传”的事提出“想教育乡下人，得先跟乡下人学学，多明白一点乡下是什么，需要什么，与城里有多少不同的地方。”¹现代文明就如那些下乡的宣传队一样野蛮地运用自己的

¹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 7 卷·小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 年，第 211 页。

方式试图改变乡下人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却忽视那些该保留的美好的品质。

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明的侵蚀，致使民族所具有的珍贵品德逐渐丧失，如正直、素朴的人情美。战争更加速传统文明的灭亡。他对于战争带来的毁灭不认同，却也曾幻想着战争能够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从而能够重新洗牌让文化重生。正如他在《长河》的题记中提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他看到了家乡的变化，一些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已经消失殆尽，“[我]还预备给他们一个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范型，……我将把这个民族为一个历史所带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¹他无比痛心于传统社会被一种庸俗功利的风气所笼罩。所以他试图通过创作来还原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时期的散文集《昆明冬景》是最能体现他对于现代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风气的变迁的感触。人们开始追求物质，强烈的物质欲望让人的心灵开始变得扭曲与浮躁。

《云南看云》中以自然云彩的变化与社会中那种只顾着追名逐利的现象形成对比，他激烈抨击那些只懂得“法币”兑换的人，渴望以爱和美来净化这些污浊。

三、生命的理性色彩

（一）解读生命意识

他把生命当作自己的信仰。他一边对生命坚定不移地信仰着，一边又对生命坚持不懈地思索着，这种不断地自我矛盾让他的生命碰撞出美丽的哲学的火花。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在“动”中，地球在“动”，人心也在“动”，并非固定不移，一切必然合理前进发展。历史在发展，人的思想情感在发展，一切还是要“动”和“变”。生命是一种动态，是一种液态，是流动的，就如那一条长河，承载的是历史，流动的是人事。我们一头扎进历史的长河，见多了生命的产生、发展、最后消亡。历史总是不停地向前的，正如流水汤汤地向前流淌。生命若不动，则是死的生命，就如同流水一样，流水不腐，只有一直在流动的水才会永远清澈。

沈从文先生从时空的角度来解读生命，生命不是静止不动的，时间在他所塑造的意象中保持着持续性和顺序性的运动方式存在着。他把时间与他的艺术形象融合起来。并将作品中的具体人物的活动给予一个时间的起点和终点，他称之为历史。在这个历史过

¹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程中，生命所代表的艺术形象不断地成长变化，从而产生一种流动的动态美，并且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生命的价值慢慢地显露出来。从纵向来看他总是把生命置于能很好的表达出他们的悲剧性的空间中，并且生命在不断地变化中展现了许多的形式。纵横交错，时空融合，构成了生命的基本框架。如《雪晴》系列中，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没有逃脱他特有的格式，以淳朴的乡下人为典型，把人物放到从一个偶遇为开始的时空中，然后通过想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生命形态。从主人公巧秀的出身前的故事到她轮回悲剧的这一生，人物在他的眼中笔下不断地成长变化。他清晰地了解到生命的不可知性，理性的判断这种命运带来的悲剧性，呈现出他一贯的忧郁审美。

沈从文先生更以哲学来进行生命的思辨，在他这个时期的文论《烛虚》《长庚》《生命》中能够很好的凸显出来，他用了哲学的方式以及抽象的语言来解释生命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文论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被多数读者所不能接受，所以他尝试了一下之后再没有做任何的尝试，因为不被理解是孤独的。他认为生命有其存在形式，首先活着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形式。即使是一片脏水塘，生长着绿霉，蒸发着臭气，泛着无数泡沫，依然是生命。生命不分贵贱高低，丑陋美好。因为生命所以存在，因为存在所以生命。这种辩证的思想观，让他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变得抽象。而在战争这种巨大的时空背景下，他对于生命理性的思索更加的深刻。“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在萝卜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外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阳光，可不大会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的生命。”¹生命的意义在于思索，或许是活着的，却永远只能生存着却不能思考着，这种生命完全不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若生命只如萝卜一样，就这么无知无觉地生，浑浑噩噩地长，寂寂寥寥地死，那生命也如一潭死水，毫无热情与价值可言。生命的理性更能从小人物对待生死的态度中获得。“死”不过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匣子”²。这种传统朴素的生死观，正是印证了他对于“人生无常”的感慨，带来一种朦胧感，正是这种朦胧感，让他对生命更加深刻地着迷地探索和思考，生命更见其深度。

（二）批判战争的非理性

带着对生命理性的思考，他就这样看着战争，看着战争带来的毁灭与重生。那么在生命中，需要毁灭的是什么，重生的是什么？

他在《变作风》中正面提及了战争，他说“我们既活在了炮火中，总得想办法活下去，而且愿意明天比今天活的更好。”因为战争使得人的生命不能自主，人在战争中总

¹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文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82页。

²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小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11页。

是离死亡的距离是极近的，你不知道此刻你是活着，下一秒可能就不在人世了。总的说来他对于战争的态度其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抗战时期，他视民族战争为正义战争。“战争既是争国格，争民族人格，并争取人类生存不可少的一个庄严名辞，即‘正义’。”¹抗战结束后，面对国内乱象，他竭力反对国力作无谓消耗，把战争视为非理性的产物。

1946年之前他不否定“战争”救国建国的目的，他虽没有上战场，却希望在战场后方能够做些事，这些事是希望作为生命个体的意识的觉醒。让战争不再是盲目地流血，而更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拼搏。然而当双方内战开始爆发后，他看见了手足同胞为了不必要的掌权之争而流血，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的杂文来呼吁和平。在他看来，只有理性才能平息内战。他在《烛虚》中就倡导理性的价值。“求民族生存，不单纯诉诸武力与武器，另外尚可望发明一种工具，至少与武力武器有平行功效的工具。这工具是抽象观念，非具体的枪炮。”又在1946年11月，发表了《从现实学习》，重申“若知从远处深处看，可就得承认要理性，要想方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这个国家的明日方好办！不仅负责方面要理性，在野各方面……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因此他想用生命的理性让人民的思想觉醒，期待着和平的社会到来。这种理性就表现为“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的无量无形的观念”²他还将理性与“五四”文化结合起来，认为“五四”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对于内战与强权，且还有个根本否定态度，永不妥协。”在《从开发头脑说起》一文里，沈从文指出：理性“能从深处思索，能反映，能理解能综合，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才会有个转机。”

战争最终毁灭的是人性，是人的精神力，是这个社会，却并未带来什么。他不停地呼吁，可是沈先生在撰文呼吁了许久之后，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打响了。生命的理性无法阻止战争非理性地碾压。他只能将内心的苦楚埋在心里，倾注于笔下。

四、生命的功利性色彩

（一）与政治远离的生命

沈先生说：“生命先有存在，才有人性。”而他对于人性问题也总是思考颇深。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是沈先生对于人性的经典自白。他也是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做的。在经历过战争这场大地震后并没有毁掉

¹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文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338页。

²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390、95、389页。

这座小庙。他将对于人性的思考放在对待民族问题上。从只针对大多是湘西地方的苗族抗争史的叙说，到在 40 年代国家遭遇民族迫害时，他开始始终站在民族斗争之列。从湘西人民反抗暴力统治的历史里，沈从文给我们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经历过那么多次磨难，却始终百折不挠地一直生存下去，这是湘西的原始的生命力的体现，带给我们一种野性的美。虽然一开始可能不是一种内心的觉醒而进行的反抗压迫，但是却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的一种条件反射的自卫。而当日本入侵之际，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也敢于吼出内心的民族之音：民族缺乏一种兽性，澎湃在每个民族爱国人士的热血无法迸发出来。

他讽刺那些只贪图享乐的人，嘲弄腐朽的官僚政体，忧患于民族的存亡。因此他对整个民族的现在及未来是颇为焦虑的。“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于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感情；对理想，异常可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¹他是爱国的，他在用他的生命在爱国。他期待着民族自尊心的重建，而不是那些每天萎靡不振的个人享乐主义、精神上依旧还是墨守陈规，缺乏对人生理性思考的人。有许多人依然是精神上的“阉寺性的人”。他关心着民族发展，民族建设。他始终以微薄的力量来保持自己对于民族的关切之心。他从不避讳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他对于国民教育的批判，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出发，渴望得到正确的有力的指导。

可是现实中的政治却无法符合他的愿想。在他看来政治是一个是是非非的东西，“余未政治，他人政治，即容易有类似歪歪曲曲之事情发生。”²一方面，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导致民族悲剧的发生。“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³他避免内战，对强权政治进行彻底地否认，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带来的腐朽的社会风气也一并地批判。他厌恶这种政治，勾勒出了一个以“爱与合作”创造出的新的“政治”。但是，这种想法明显太天真了。

（二）被文学重建的生命

自此他将民族性寄托于文学的重建。他不喜欢文字与政治挂钩，希望通过一种文学

¹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 11 卷·文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 年，第 294 页。

²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 14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4 页。

³ 靡华菱：《郭沫若和沈从文的文字恩怨》，《新文学史料》2001 年第 3 期。

运动来重建民族的自尊心，来摆脱政治对于文学的桎梏。在《致子平》的信中说：文学运动目标之一就是“否定纵横政治，重造一清新明朗新的青年人生观”。《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从开发头脑说起》等文章，都强调对民众的教育“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赋予文学理性启蒙的社会责任。“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决不会还需要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有人说他的作品带有革命精神，主张革命主义，我却觉得其实不然。他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在心里为文学建了一个碑，这是他内心不可磨灭的信条。纯文人的思想，希望用文学改变现状，在文学上有个英雄榜样。他和一些与他同辈的人一起，在战争的废墟上，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下，坚决地维护着文学艺术这块阵地，以兢兢业业诚实的劳动，彰显着坚韧的民族文化精神。

他十分推崇鲁迅的精神但他又与鲁迅不同。他们都意识到必须要从精神方面来开化人民，但是两个人的文学之路却选的不同。鲁迅以文学为阵营，纸笔为武器，沈从文却期望民族能够有个觉醒的人，以文化赋予的爱和美的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或者有那种原始的生命力来与现实进行抗衡。可是这种思想摆脱不了文人的理想主义。文学的堕落是由于“与上海商业资本逐渐结合为一”，“与政治逐渐结合而为一”，消泯了“五四单纯虔诚精神灌输”。改变这种现状，一是要理解五四精神。“对于强权所抱有的怀疑否定的精神……天真和勇敢，尤其是不能缺少。”¹而他注意到历史现象中有一个有权力的总是害怕自己所管辖的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他们一直排除异己，而那些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竟是绝对的服从，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完全妥协或放弃，这种生命的存在是一种权力压倒性胜利的结果，所以他首先肯定了文学重建的作用。其次要大力发扬五四精神，然后要实践五四精神，最后采取合理的方法“重造文运”。他始终固守着这一片土地，用对于文学永远不会熄灭的热情以及旺盛的生命力来追求爱与美，并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爱与美。他期望更多的作家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一种正确的人生观，“我们盼望有这种更健康坚实的青年作家，在国内各地普遍生长，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²他执着的追求着对于传统文明的保护与传播，最终所追求的也不过就是民族复兴这个愿望。

五、生命的非功利性色彩

¹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版，300—301页。

²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版，270页。

（一）追求美

他在对生命的探索的过程中，最终追求的即是爱与美。在 40 年代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于美与爱有着独特见解的审美情感的生命。沈从文认为最大的美即自然。他极其的推崇自然，为生命唱一首首的赞歌。生命是自然赋予的在湘西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潜藏着一股原始的粗犷的生命力，它表现于一切人事的爱憎和哀乐。沈从文对这种原始性的生命力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表现形式，他既来自大自然，那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禁制，“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所以他在不停地追求一种生命的“美”，“生命之最大，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美在生命，美在强健的壮硕的精力弥满的生命。只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展现真正的美。在这个战争的年代，当人们的内心被战乱的恐惧所占据，被尘世的浮躁所传染，被对物质生活的欲望所蒙蔽，他渴望的就是最初的最纯粹的自然之美来净化这一切在《虹桥》中的谦卑的生命，面对永远充满着奇迹的大自然，由衷的被折服。而相较于把自己的生命化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民，外来的一切都是无力的。不论是自然的虹，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炊烟袅袅，在这样的美景之前，所有的言语动作都是苍白的，最聪明的行为就是沉默。生命之于自然是谦卑的，和谐相处远比一心想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高明得多。生命在自然面前，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敬畏自然，也要敬畏生命。

美也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摘星录》与《虹桥》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虹和星都若在望，我俨然可以任意去伸手摘取。可是我所注意摘取的，应该说，却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特别是《虹桥》表达了一个主题“美是无法表现出来的”。“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们“只有沉默，崇拜”，“一切意见一切成就都失去了意义”。《烛虚》中他曾有一个看法，即“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因为大部分所谓‘印象动人’多近于从具体事实感官经验而得到。这印象用文字保存，虽困难尚不十分困难。但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就只有音乐，或壮丽，或柔静，同样在抽象形式中，方可望能将它好好保存并重视”，¹一切都再没有比音乐更能表现出这种美，艺术才是最高的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家用一句话将世间最动人的美概括了出来。

另一部小说《看虹录》更阐述了“美即神”这一美学体系得核心理念。他为美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使得美笼罩了一层神性的光辉。他用“生命”的形式来表现美的意象。他带着一点老庄的道家传统审美思想，认为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思想，都是自然的恩赐。

¹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 11 卷·文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 年，278 页。

作家通过“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对女性和情欲的书写，展现人类爱欲的唯美。作家将“美”与爱欲、生命形式相联系，表现生命的神性与庄严，进而确立“神在我们生命里”，“美就是神”的观点。美是无处不在的，一朵花，一棵草，一根线条，尽管是小物，亦可以见出魅力之处。即使短暂如流星之美，长庚如日光之美，都彰显出美丽的一面。而用心懂得记录下这种美得，不论用什么方式，都是知晓生命之美的美得有心人。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永生不灭。被金钱、名声所桎梏的人，无法感知美带来的永恒，尽数钻进了愚昧与麻木之中，生命如死水一般滞留不前，已无法变化。他信仰美，尊崇美能给予生命一种神性，那种被阉割的生命能因之得到了解救。

（二）追求爱

在生命中，他推崇一种大爱，企图用这种大爱来感化小爱，让人人都能够和睦相处。他在40年代所新尝试的那种文体中一主要的“七色魔系列”，其中的《黑魔》从现实人事和宗教典故等方面，阐述坚守“美与爱”的信念。星光、彩虹被赋予美的象征而获得富有启示性的审美观照。“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¹《青色魔》展开了《黑魔》所涉及的佛经故事，阐明宗教与“美与爱”的关系。文本描写驹那罗王子的双眼由失明到奇迹重生的故事，揭示“眼无常相，先知早知，因爱而成，逢妒而毁，由忧生信，从信生缘。”在沈从文看来，“美与爱”同样需要宗教般的信仰和执著。他从宗教的方面揭示了这个主题：讲述了一个“爱与美的救赎”的故事。正是由于爱与美的最后的救赎，所以我们从悲剧中脱离了出来，感受到了生命带来的美好。

在《七色魔》系列中的作品带有着浓浓的佛教的“众生平等”的心态。佛家讲究的是一种超然，而他也超然于物外。他需要一种信仰，而佛学正好给他带来这种契合他内心思想的信仰。他借以佛经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于生命的思考。即只有爱与美才能够宽恕，才能够使丑陋最终得到救赎。佛学正可以体现出他对于人性思考的神性的体现。他以颜色作为故事的引导，重写了佛经故事，想以爱与美来凝聚民族力，发表了自己的这些小说，却发现自己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的呼喊却没有共同者。《白魔》说：“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大多数人的作人兴趣，即维持在这个钞票数量争夺过程中……因之一切责任上的尊严，与作人良心的标尺，都被压扁扭曲，慢慢失去应有的完整。”

当现实的世俗开始压迫“爱”，他忧心忡忡。正当对外战争结束后，本来有无限美好的前景等待着这个国家：物产丰富，工商发展，人人安居乐业，百废待兴，却被内战破

¹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散文、诗），三联书店，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坏殆尽，随之而来的竟然是炮火声。他不止一次呼吁应当用爱与合作来让双方放弃仇恨。这些的种种让他开始追求以“爱”作为信仰的宗教。人心太复杂，生命何须要带上那么沉重的枷锁，不停的追求名与利，也就是为了追求一个“永生”的生命，让生命有意义。殊不知，只有爱是永生。一切的生命来源于“爱”，最后回归于“爱”。我们被爱所包围着，爱延续着生命的一代接一代。我们应当以爱作为我们的信仰，以爱与美为宗教，金钱不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官职也不能。只有爱与美才能给生命创造奇迹。只有追求美与爱，才能激发对于生命深度的探索，才能树立进步的人生观，发展更好的生活。

六、结语

我们可以发现沈从文在 40 年代以“生命”作为固定的主题，由于他对“生命”深入的思辨的思考，对于战争与政治的不赞同，对于美与爱的不断追求，更为他的文学史又添加了光辉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发行，1983年5月第1版。
- [2] 沈从文：《沈从文别集—七色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 [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杂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
- [4]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 [5]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 [6] 薛慧：《论沈从文40年代创作中的“生命”主题》，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2月第26卷第2期。
- [7] 许君毅：《〈青色魔〉沈从文40年代对佛经故事的重说》，吉首大学学报 2010年1月，第31卷第1期。
- [8] 邓齐平：《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吉首大学学报，2007年5月第28卷第3期。
- [9] 邓齐平：《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浪漫与寂寞》，求索 2009年7月。

沈从文 40 年代创作年表

1940 年

4 月，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主编《战国策》

5 月，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论文《文运的重建》，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溶合为一”和“与政治溶合为一”。

6 月，在《学习举例》栏刊出《向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和《由冰心到废名》等文。

1941 年

5 月，在西南联大演讲。演讲稿以《短篇小说》为题发表于《国文月刊》。

8 月，出版散文、评论集《烛虚》。

1942 年

5 月—10 月，长篇小说《长河》和《秋收和社戏》等部分章节在《自由中国》等杂志刊出。

10 月，在《人世间》连载小说《芸庐纪事》。

11 月—12 月，在《当代评论》连载小说《新摘星录》。

1943 年

1—2 月 在《文学创作》连载哲理性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6 月 在重庆出版文论《云南看云集》。

7 月 在《新文学》发表《看虹录》，后又发表《摘星录》。

4—12 月 陆续推出修订的小说集，统称“沈从文著作集”。

1944 年

1 月，在《当代文艺》发表《雪晴》，与后来的《赤魇》、《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共同组成中篇故事集《雪晴》。

5 月上旬 出席“五四”25 周年晚会并发表演讲。

1945 年

12 月 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看虹摘星录〉后记》。

1946 年

5 月 继续担任北大教授。

7 月 30 日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发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9 月 在上海《文学月刊》发表《一种新的文学观》

10 月 在《上海文化》月刊发表《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11 月 在《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回顾自己文学道德的长文《向现实学习》。

1947 年

3 月 在津、沪《大公报》同时刊出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

5 月 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论文《五四》。

10 月 为北平《益世报》主编的《诗与文》创刊，并连续发表《诗与文简稿》及《编后》等多篇。在上海《益世报》发表《一种新希望》。

11月 在《知识与生活》杂志发表《学鲁迅》。

1948年

1月 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

9月 在《论语》发表《中国向何处去》。

10月 在《论语》《大公报》相继发表《收拾残破》和《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一种意见》。

1950年

3—12月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写成《我的学习》一文发表。